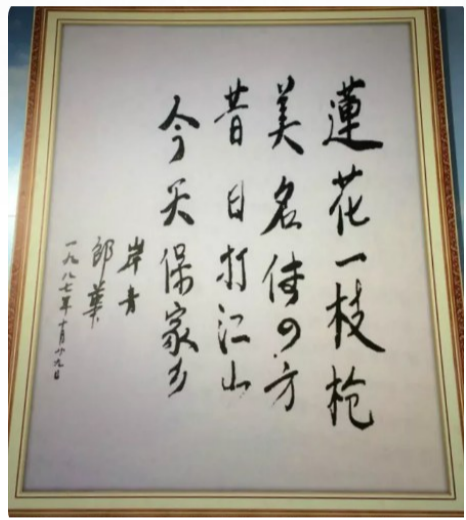




贺国庆： 舍命护下莲花一支枪 种下燎原一把火

贺德足



1987年10月29日，毛泽东和邵华参加“莲花一支枪”博物馆时，写下这首赞诗。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莲花一枝枪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支陈旧的俄国造步枪。这就是著名的“莲花一支枪”，在这枝枪背后，有一段流血牺牲、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而这支枪，与攸县也有着深厚的渊源。

贺国庆(1899-1929)，又名福庆、福勤，1899年生于湖南省攸县柏市石桥圳下。父亲洪承茂，由于家境贫寒，无奈出抚到江西省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一个贺姓人家，改洪姓为贺。大革命时期，贺国庆由中共攸县县委书记陈竞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莲花县赤色队副队长，后任莲花县红色独立团连长。

1927年7月，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奉命参加会攻永新城，营救革命同志的激烈战斗，战士贺国庆缴获敌人一支崭新的“俄国造”步枪，为奖励他的英勇作战，第二天农军决定把这支枪交给贺国庆使用和保管，他视枪如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莲花县地方反动武装“靖卫队”队长李成荫，带领靖卫队强迫农军交出59支枪，唯有贺国庆保管的那支枪未上交。一次机缘巧合，贺国庆听到李成荫要搜枪便趁敌人不注意深夜潜回家，把枪拆成三部分，分别藏在贺氏宗祠的神龛中、龙山下、以及天井中的凤尾草内。后来敌人围攻、紧追，搜集这支唯一没有上交的枪，贺国庆又秘密将枪藏于攸县柏市石桥圳下弟弟家的红薯窖里。

李成荫知道这个消息后，不敢轻易从江西越湖南深山林搜集这支枪。便带着靖卫队闯进贺国庆家，将其父亲贺承茂五花大绑，严刑拷打。老人宁死不屈，被残酷的李成荫活活烧死，场面惨不忍睹。之后，贺国庆的弟弟贺国强也被李成荫通反动势力而杀害。然而，这支枪始终藏于柏市石桥圳下的红薯窖里，始终掌握在贺国庆手中。

1928年春，中共莲花县委负责人陈竞进和柏市风塔中共党组织负责人谭继岳，秘密找到贺国庆，通知他参加莲花县狮子岭的会议。

会议传达毛主席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宁岗召开的有永新、莲花、宁岗等三个县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指示各县迅速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莲花县委决定以贺国庆保管的这支枪为基础，成立“赤卫队”，开展武装对敌斗争。于是，贺国庆、陈竞进、谭继岳一起回到攸县柏市石桥圳下，从红薯窖里取出这支枪参加莲花县组织的多次武装斗争。上级党委指示莲花县要重新扩大“赤卫队”，陈竞进任队长，虽有100多支枪，但基本是红缨枪。

1928年9月的一天，反动派陈朝湘带着靖卫队，清剿赤卫队。这时，赤卫队员苏广明、王仁妹、苏国贞、杨建等五人，奉命潜入靖卫队内部做卧底。并及时将敌情的情况报告给陈竞进，等待敌人上钩。由于情报准确，敌人来后，陈竞进队长一声令下，贺国庆那支枪首先向敌人开火。苏广明等五个赤卫队员调转头杀向敌人。

瞬间，枪声和喊杀声如雷贯耳，陈朝湘部队晕头转向，摸不清赤卫队的底细，急忙撤回县城，此仗赤卫队缴获敌人11支枪。加上贺国庆和苏广明五人的枪，一共有17支枪，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心力和斗志。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又发给赤卫队一批枪。从此，莲花赤卫队发展成为“莲花独立团”，陈竞进任团长，刘建绪任党代表，贺国庆任连长。到1928年11月，莲花独立团发展壮大至300多人，220支枪。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从此，“莲花一支枪”闻名全国。

但天妒英才，1929年春，贺国庆在攸县漕泊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流血不止，昏迷数次。临终前，他把这支枪交给战友说：“我没有什么遗产，这支枪是我全家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请交给党，让它继续去消灭敌人。”

(本文原载《史志株洲》)

炎陵周介甫： “为主义而牺牲，虽九死犹不悔”

王锡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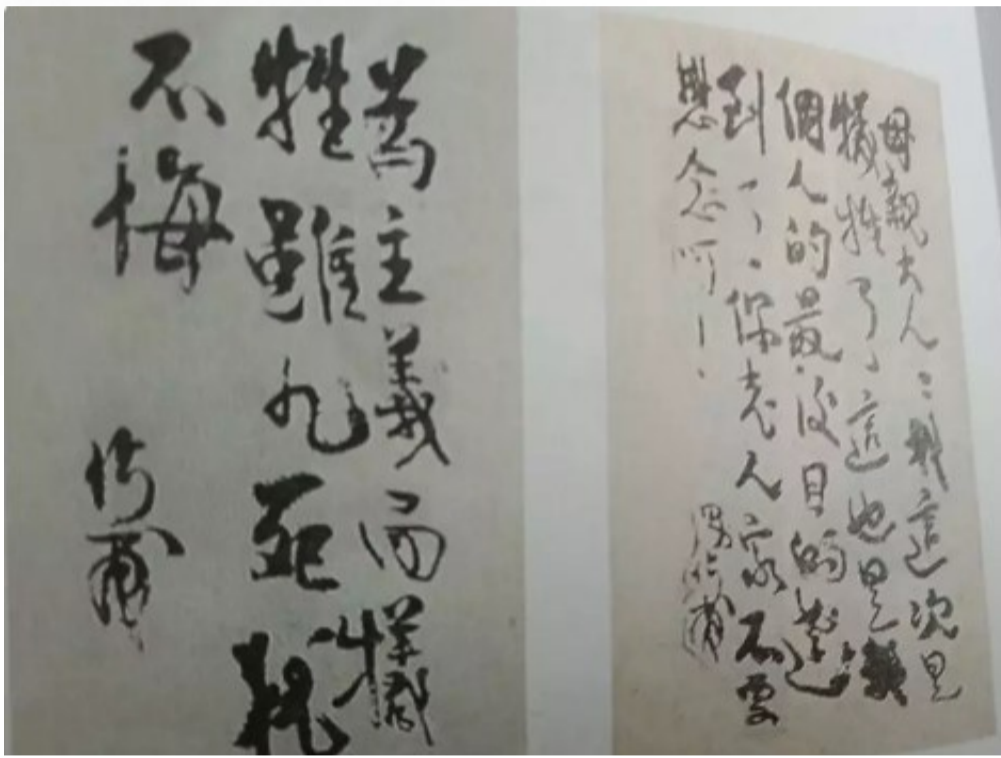
在炎陵县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活动纪念馆，陈列着一封遗书手迹。这封遗书只有51个字，是革命烈士周介甫留给母亲的遗书。每一个看到这封遗书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无不为之感动。

周介甫，1903年10月出生于酃县(今炎陵县)中村乡的书香门第，1920年求学于长沙岳云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革命道路。1926年，酃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周介甫回到酃县中村，办起了农民夜校，招收了30多名青年农民到夜校学习。他亲自给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地主豪绅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启发广大农民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在他的发动下，成立了酃县最早的农民协会，斗争矛头直指土豪劣绅，实行减租、退息。

当地土豪对此恨之入骨。伯父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是周家的叛逆”。周介甫以笑回答：“你骂得对，我不仅是周家地主的叛逆，而且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叛逆。”几句话把伯父气得瞪目结舌，无话可说。周介甫的革命行动，赢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1926年9月，酃县农民协会成立，大家一推举他任委员长。1927年11月，经刘寅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中村，帮助酃县成立了中共酃县委员会和中共中村区委，周介甫被选为中村区委委员。在随后的插牌分田运动中，毛泽东又亲自提名，由周介甫和部队干部谭希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为了解除群众顾虑，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周介甫当着3000余人参加的军民诉苦大会烧毁了自家的土地山林契约，把所有土地、财产、粮食、农具全分给了贫苦农民。从而使中村插牌分田得以顺利进行，为今后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开了个好头。此举获得毛泽东称赞。

4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离开酃县，地主反动势力乘机反扑，县委和中村区委机关被迫迁往平乐茅坪的大山之中。为了保卫苏区，周介甫广泛发动群众，组建了茅坪农民游击队，开展打土豪的斗争。一天，周介甫带领70多名游击队员开赴新开，活捉了土豪欧学书，正在审问之时，100多名挨户团兵包围了游击队。周介甫当即指挥游击队分路突围。周介甫率领的一路途中多



周介甫写给母亲大人的遗书，体现了共产党人对理想新年的执着追求和对党绝对忠诚的赤子之心。

次与敌遭遇，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俘被杀，最后剩下周介甫一人，退到了一处悬崖顶上。敌人妄想活捉他。周介甫手持大刀，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战，连续砍伤了几个团丁。

眼看冲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有被活捉的危险，周介甫一转身跳下了几丈高的悬崖，幸亏被树枝挡住了几下，掉在松软的沙滩上。苏醒之后，他爬到了一户农民家里。户主正是贫民夜校的学生陈玉莲。在她的精心护理下，周介甫的伤势有了很大好转，随后转移到道任的大山里。在这里，他又得到贫苦农民张庚秀的照顾。痊愈之后，准备出山寻找党的组织。不幸被敌人抓走。第二天，周介甫被押到龙潭何家大厅的临时监狱。

在监狱，周介甫遭到严刑拷打，衣服浸满了鲜血。他目光如剑，严辞相对：“我来了，就不准

备回去，要想从我口里得到共产党的机密，那是白日做梦，白费心机。”当晚，周介甫给母亲写下了51个字的遗书：“母亲大人：我这次是牺牲了，这也是我个人的最后目的达到了，你老人家不要挂念啊！男介甫为主义而牺牲，虽九死犹不悔。介甫。”

第二天，十余名挨户团匪兵用刺刀刺穿周介甫的双手虎口肌肉，用铁丝穿紧押往县城。鲜血染红了双手，一滴一滴掉在路上，沿途百姓见此惨状，无不切齿痛恨。周介甫忍着穿心的剧痛，步履十分艰难。终因流血过多，昏死倒在了路上。苏醒过来后，他再也无力行走，团丁请示排长：“怎么办？”排长回答：“走不动就打！”一名匪兵当即开枪，周介甫鲜血直流，染红了整个山岗，年仅25岁。

(原载《史志株洲》)

331厂试制成功了新中国 第一批航空发动机

牛八

1954年8月16日，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在(株洲)国营331厂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主席写信给全厂职工祝贺嘉勉。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航空工业更是空白。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筹划创建航空工业。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快了航空工业建设的步伐，国家成立航空工业局，决定由株洲国营331厂试制两种型号的飞机及其航空发动机。

株洲国营331厂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械修理所。1951年10月，待修的苏制“爱姆十一型”航空发动机运送到工厂时，工厂还在搞基建，只得边基建边修理。在修理发动机过程中，不断试制发动机附件和主要零件。到1954年，共修理“爱姆十一型”航空发动机575台，制造各种零件322种，及时装备了空军，支援了战争，同时也为工厂从修理过渡到制造积累了经验。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国家计委就将331厂列为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我国早期六大航空企业之一。并批准了331厂改建为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计划。同时要求工厂在1955年9月底前将“爱姆十一型”航空发动机试制成功。

为了加强对试制工作的领导，中央将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李荫冠同志调来担任厂长兼党委书记；第二机械工业部派湘江副局长率工作组驻厂督战；20位苏联专家陆续来厂指导试制工作。

试制生产计划分解到各车间、工段和科室。工具车间仅用80多天时间，就制造了专用工装1300多种，确保了新机试制的需要；锻造铸钢车间冒着夏天的酷暑和炉边的高温，及时为新机零件赶制毛坯；电镀热处理车间领导带队北上哈尔滨，在苏联空军“赴华修理列车”上学习电镀技术，回厂后土法上马，完成钢模氧化任务。工程技术人员平均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坚持“大事不过天，小事不过点”，及时处生产技术上问题。苏联专家们夜以继日地巡视在生产现场，解决不少试制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通过全厂上下同心协力，团结奋战，7月29日，331厂胜利组装出01、02、03号三台发动机。8月4日，由使用单位和二机部代表共同抽选了03号发动机，进行连续运转250多个小时测验，未发现异常现象，技术性能良好。经国家验收委员会全面审查，签署了鉴定结论。

1955年8月26日，331厂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庆祝“爱姆十一型”航空发动机试制成功。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中央军委军工部、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空军、海军、湘潭地委、株洲市委、市政府均给大会发来贺电贺信，赠送锦旗，还给全厂职工颁发奖金8亿元(相当于新币8万元)。



攸县县城老新街旧貌，谭志道牺牲的地方。

谭志道：比生命更珍贵的铁盒子

曾建荣

谭志道，1906年出生于攸县大同桥乡吴家垅，1915年上小学，1925年在茶陵遵道中学毕业后任教于攸县城关豫章小学教书。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14日当选为中共攸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委员，同时分管统战工作，兼任国民党攸县党部书记。9月，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政治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兼任攸县农民运动研究所副所长。从此以后，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党组织的建设和农民运动。

1927年初，兼任攸县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打着湘保安司令旗号的罗定率部回攸县，向共产党家乡，敲开二兄谭润身的家门，将随身带着装有全体党员名册和党的重要文件的铁盒子，交给哥哥保存。并叮嘱润身：“这是几十人的生命，革命的家业，是比金子更为珍贵的东西，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万一遇到特殊情况，就要设法转移或销毁，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志道喊醒父母兄嫂作了简短的告别，连夜返回。于

天亮前赶到了银坑山区的秘密据点。这次家乡夜行，竟是他与亲人的诀别！

6月19日，在银坑坚持党的秘密工作的中共攸县地方委员会负责人谭志道和余来、刘谭豪等三人，因叛徒傅继七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年仅22岁的谭志道，在生死关头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唯恐担心交给胞兄、中共党员谭润身保管的铁盒子的安全。就义前夕，谭润身来探监，趁监管不注意，告诉谭志道铁盒子已经安全转移。谭志道从铁窗中伸出双手紧紧抱住胞兄，激动地说：“二哥，你为党立了大功，保住了同志，保存了党的力量，敌人决不能将共产党人斩尽杀绝！”

6月22日，全城戒严。敌人将余来、谭志道、刘谭豪三位年轻的共产党人押赴刑场。他们三人昂首挺胸，步履从容地向城南沙洲走去，沿途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万岁！”“雄壮的口号在天空回荡，在人们耳中震荡。他们用鲜血给自己的革命历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革命者的牺牲，是对后继者的激励。谭志道牺牲后，他的继子谭正德、二兄谭润身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参加了土地革命。1949年8月，这个装有党员名册和党的重要文件的铁盒子由谭志道烈士的家人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解放军。

醴陵郭鹏： 红军中的关云长

叶介甫



郭鹏(1906-1977)，醴陵人。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六军第九团班长、排长、连长，红十八军第五十二团营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团团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红三十二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参谋长、副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武装部部长，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干部大队大队长、支队副司令员，湖南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三五九旅旅长，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团长，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36年7月，郭鹏时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随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到了阿坝。

一天，贺龙命令郭鹏带领12名骑兵去红四方面军医院布置行军任务。医院离总指挥部15公里，途中有小股反动武装潜伏，经常袭击红军。临行前，贺龙嘱咐郭鹏要小心。郭鹏率部到达医院，布置完任务后已是深夜12时。他即刻回返，途中，刚走过五师驻地不远，早已埋伏在密林中的敌人突然向他射来一排子弹，郭鹏受伤从骡背滚落，不省人事。

过了一会儿，他从血泊中苏醒过来，心想：我得赶快走，躲过敌人的追击。刚走几步，转念一想，敌人就在附近，要是跟着脚印追来，怎么得了？于是，他首先把自己的脚印弄乱，再涉水过河。河水湍急，一下子把他冲下二三十米远，好不容易才爬上岸，被前来寻找他的红军骑兵发现，搀扶他回五师。五师政委谭林见郭鹏伤势严重，赶紧叫医生给他上药，随即派人将他送往总部医院。这是郭鹏在红军时期的第14次负伤。

郭鹏到医院后，贺龙、萧克、关向应等都赶到医院看望，见他全身被打了大小7个窟窿，最大的一个又恰在小肚子的左后侧，都认为郭鹏这次怕是没得救了，围着他的都半天没有开口说话。萧克看了一眼郭鹏全身，如此之惨，眼泪夺眶而出，急忙背过身。贺龙怕郭鹏见到萧克的眼泪，急忙把身子挪了一下，遮住了萧克，紧俯在郭鹏的耳边，轻声问他：“你觉得怎样？”

郭鹏吃力地回答：“不要紧，请贺总放心。”

此时，郭鹏不是担心自己的性命是否能保住，而是担心部队就要出发了，前面就是千里不见人烟的大草地，部队缺粮，不少人累得走不动路了，自己伤成了这样，还怎么跟得上部队。贺龙从他痛苦的表情上，看出了他的心思，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绝不会把你丢在这里，这一点你可一定要放心。”郭鹏一听，眼泪流了下来。

贺龙安排人把郭鹏送到了时任四师卫生部部长贺彪那，边行军边治疗。到四师卫生部的贺天下午，贺彪与潘秉山医生便给他检查伤口。经检查，他们发现，子弹穿过了郭鹏的胯骨，距腹部很近，所幸腹部未被洞穿，淤血才没有注入腹内，保住了性命。但郭鹏体内的子弹正在不断氧化，毒害着周围的血肉，再过几天腹壁就会发炎、腐烂，而一旦烂穿腹壁，就会危及生命。因此，贺彪与潘秉山决定立即手术，把枪弹取出。但当时既无麻药，又无手术刀，郭鹏身体又特别虚弱，困难和危险都很大。

贺彪和潘秉山决定向五师借点“寒冷麻药”凑合一下，没有手术刀和剪子，就找来一把剃刀，一把剪刀作代用品。贺彪与潘医生向郭鹏讲明了手术的困难，郭鹏坚毅地回答：“怕什么，我又不是头一次开刀！”

子弹终于被取了出来，但郭鹏的骨头被子弹打碎了，留下锯齿形的接口，必须用锉将骨头锉平，再用剃刀刮干净，否则还会发炎、化脓。刮骨开始了，只听得骨头咯吱咯吱响，痛得郭鹏汗如雨下，但他咬紧牙关，拼命忍受，手术最终得以顺利完成。

贺龙赶来看望，一手握着潘医生，一手握着郭鹏说：“神医！神医！硬汉！硬汉！三国时关公刮骨疗毒，被传为千古美谈，当今郭鹏草地开刀，也会在红军中传为佳话。”

后来，毛泽东同志听闻了此事，夸郭鹏是“红军中的关云长”。

(转自醴陵《开卷有益》)